

中国封建社会 农民革命哲学史略

襄樊市工人理论组

武大哲学系72级学员

三、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发动者王薄的 “世事可知”论和暴力革命思想

公元八五一年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南北朝长期的分裂局面，继秦汉之后我国又实现了多民族的政治统一。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使隋王朝短期内成为一个强盛的封建帝国。但隋朝封建统治集团代表着门阀豪族的利益，以疯狂的手段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奴役和剥削。公元六〇四年隋炀帝杨广上台以后，更是倒行逆施，横征暴敛，为了满足无穷贪欲，役使几百万民工去营建东都洛阳，大筑林苑，大修行宫，大开运河，大造楼船，强选民间美女入宫，宫廷乐舞队竟达三万多人；又经常带领后妃、诸王、文武百官、僧尼道士等一大群乘船几千艘外出游乐，单是强征来拉纤的船夫就达八万多人，并强迫沿途几百里的老百姓“献食”。封建统治者，这样不顾人民死活的骄奢淫逸，迅速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隋炀帝为了炫耀武力，还征发大量人力物力，任意发动侵略战争，三次出兵攻打高丽，都以失败告终，出征的丁夫大半死亡。侵略战争带来的无限度的徭役和沉重的赋税，使“耕稼失时，田畴荒芜”。“百姓穷困，财力俱竭”，以至“人饥相食，邑落为墟”，把广大农民推向死亡的深渊，终于点燃了农民革命的怒火。

战争引起革命。隋炀帝侵略高丽的不义战争，正是埋葬隋王朝的农民大革命的导火线。这次农民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是由王薄在山东长白山首先点燃的。王薄在发动起义的实践过程中，集中了广大农民的革命智慧，预见到隋王朝对内残酷剥削压迫、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必然导致灭亡，因而提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知世”说，并热烈歌颂了劳动人民拿起武器来进行暴力革命的正义性。这对于“共苦隋政”、奋起斗争的广大农民，是极大的鼓舞；对于隋王朝为维护黑暗统治而拼命宣扬的儒、佛、道唯心主义的反动说教，是沉重的打击。

“世事可知”的朴素唯物主义

隋朝统治者在残酷压榨劳动人民的同时，大搞儒佛、儒道的反动思想同盟，用宗教欺骗来补充儒家唯心主义。隋炀帝一上台，一方面把孔老二尊为“先师尼父”，鼓吹要“博访儒术”，把孔孟之道说成是“人伦之本”、“立身之基”；另一方面，又大肆提倡佛、道二教，到处建立寺庙，扶植僧侣贵族，修治佛经就达二万九千余部，妄图这样来散布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不

可知论，麻痹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放弃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要求，安于现状，听天由命，任凭封建统治者的宰割。

为了揭露封建统治者玩弄的这套愚民政策，动员和鼓舞劳动人民起来进行斗争，山东邹平县农民出身的铁匠王薄，首先举起了革命造反的旗帜，在贫苦农民中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戳穿儒、佛、道三教所编造的各种歪曲现实、掩盖矛盾、愚弄人民的谎言。

孔孟宣扬“圣人先知先觉”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动谬论，佛教、道教则鼓吹虚无主义的“出世”哲学，王薄与之针锋相对，豪迈地自号“知世郎”，明确宣称“世事可知”，肯定客观现实世界的各种事变都是可以革命人民所认识的。王薄根据对“世事”的深刻认识，作了《无向辽东浪死歌》等，号召广大被压迫人民昂起头来，都作“长白山头知世郎”，认清隋炀帝这个“昏君”的黑暗统治是长不了的，预见到世道正在变化，只要劳动人民手里的“竹竿上有了枪头”，就会使“昏君身上没了人头”，隋王朝灭亡是不可避免的。（曾慥：《类说》引《河洛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民间故事选》）王薄的这种“知世”哲学，是对柳下跖深知“人事”、不信“鬼事”和陈胜痛斥“祸福在天”、只讲“人间近事”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继续发展，是对孔孟儒家及一切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有力批驳。

孔孟儒家鼓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和先验论，诱骗人们背向现实，要人们去“知天”、“知天命”；王薄坚持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可知论，提出要“知世”，就是要认识和了解现实世界。“知天”和“知世”，一字之差，正表现了两条认识路线的根本对立。

孔孟儒家鼓吹“上智下愚”，诬蔑劳动人民是“困而不学”、“不知天命”的“下愚”、“群氓”，是天生的被统治者；王薄针锋相对地指出，劳动人民最“知世”，卑贱者最聪明，革命群众最懂得革命暴力势不可挡，侵略战争必然失败，决不为封建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去浪死辽东，而要举起大刀长矛造封建统治者的反，直到把隋炀帝这样的“昏君”的头砍下来。

王薄宣称“世事可知”，号召作“知世郎”，就是动员广大农民正视现实，揭露矛盾，从自己受剥削、受奴役的现实生活中来认识隋王朝的残暴腐朽，认识自己受苦受难的社会原因，认识封建统治者的滔天罪恶。这种罪恶，正如稍后农民起义军在讨伐隋炀帝的檄文中所愤怒揭发的：“一时收十岁之租，一日枉千金之费，夫行妇寡，父出子孤”，“痛结人心，悲缠华夏”！“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曾慥：《类说》引《河洛记》；《资治通鉴》卷一八三）朴素唯物主义的“知世”哲学，是革命农民认识现实世界的精神武器。

“提刀向前”的暴力革命思想

认识现实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现实世界。革命农民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意识到要改变封建统治的黑暗世界，必需拿起武器来进行斗争。王薄在发动和领导起义的过程中，首先号召敛铁器、做枪头。长白山区的贫苦农民齐心响应，家家只留一把切菜刀，把大小铁器都改铸成刀枪，组成“手使竹竿枪，天天打胜仗”的第一支农民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占领了山东两府三州三十三县，点燃了隋末农民大革命的燎原烈火。在战斗中王薄所作的几首政治鼓动歌谣，充分表现了觉醒了的农民意识到只有用武器批判才能改造现实世界的暴力革命思想，是我国农民革命文献中极为宝贵的战斗诗章。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

长稍（音朔、长矛）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食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古谣谚》卷八十五》

“要抗兵(征壮丁)，要抗选(选美女)，
家家都把铁器欵，
欵起铁来做成枪，
昏君赃官杀个光！”

《《中国民谣》》

这里，“知世郎”王薄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革命真理，就是劳动人民要反抗剥削压迫，打掉封建皇帝的淫威，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扫荡其势汹汹的“官军”及其大小主子“昏君赃官”，一句话，要改造封建统治的黑暗世界，唯一的办法是拿起刀枪来展开武装斗争，实行暴力革命；劳动群众一旦组织起来，团结战斗，“家家都把铁器欵，欵起铁来做成枪”，“长白山头百战场，十五五把长枪”，并且“提刀向前”，扫荡“官军”，就一定可以把“昏君赃官杀个光”，杀出一个“人人得太平”的理想世界。

正是在王薄这样富有战斗性的朴素唯物论和暴力革命思想的动员和鼓舞下，广大贫苦农民纷纷投入了革命洪流。革命真理与群众实践相结合，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隋末农民大革命的疾风暴雨，终于埋葬了“甲兵强锐”的隋王朝。各路农民军，坚持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资治通鉴》卷一八二）；“官人贪浊者皆杀之”（《旧唐书·杜伏威传》）“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资治通鉴》卷一八二）；荒淫残暴的隋炀帝吓得神经错乱，摸着自己的脑袋日夜悲叹：“我这个好头颅，不知谁来砍它”，最后也落得个被缢死的下场。恩格斯指出：革命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隋末农民军的革命锋芒所向，对门阀豪族这一极端黑暗腐朽的社会势力给予了摧毁性的打击，对一批“方领矩步”的反动儒生实行了无情的镇压。经过这次革命的大扫荡，出现了“学者沦丧，儒教凌迟”，“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隋书·儒林传》）的大好局面，为唐代前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法家路线得以推行创造了历史前提。

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武器批判和批判武器，在我国历史上都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四、唐末农民革命领袖黄巢的 “均平”纲领和“冲天”思想

隋末农民大起义所推动的社会发展，到唐中期以后又停滞下来。经过“安史之乱”的唐王朝，政治日趋腐败，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官僚大地主疯狂兼并，封建朝廷恣意搜刮，广大劳动人民又被推进“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哀号于道路，逃亡于山林”（《全唐文》卷八〇四）苦难深渊。唐末藩镇之间连年混战，加剧了社会危机，“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极端尖锐化。从九世纪初起，各地农民起义已风起云涌，终于汇合成席卷全国的农民革命大风暴。

唐末农民革命领袖黄巢（公元？—884年），山东冤句（今曹县北）人，年轻时，“粗涉书传”，长于骑射，为反抗唐王朝官营盐价猛增到三百七十多倍，曾从事武装贩运私盐的活动。公元八七五年王仙芝起义于长垣（今山东濮县），次年黄巢即在曹州聚众几千人起义响应。由于黄巢在起义军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基本坚持了农民革命路线，不断战胜了内部的妥协投降倾向和敌人的招安诱降阴谋，因而能够率领日益壮大的起义军，奋战十年，纵横万里，把革命烈火燃遍

全国，以“冲天”的革命气概，杀进长安，把唐王朝的腐朽统治冲得七零八落，取得了农民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同时，在群众斗争的大风雨中，反映广大农民的革命要求，鲜明地提出了以“均平”和“冲天”为核心的政治纲领和思想纲领，把我国农民的革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横行天下”的农民革命路线

路线决定一切。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革命运动，是在农民起义军内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公元八七三年，深受剥削压迫，又遭连年水旱的山东，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预告着革命暴风雨即将来临。公元八七四年，王仙芝率领数千群众在河南长垣起义，自号“天补均平大将军”，随即攻下曹州、濮州，发布文告，揭露唐王朝官吏贪暴、赋税苛重等罪恶。次年，黄巢在冤句起兵响应，与王仙芝会合，攻占州县，“横行于山东”，受到劳苦群众的热烈拥护，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几万人。

起义军连续粉碎了唐官军的两次反革命围剿，转战到河南、安徽、湖北地区，革命形势在胜利发展。正当这时，唐王朝一批官僚——汝州刺史王镣、蕲州刺史裴渥等，以“献城迎降”方式钻进了农民军，被王仙芝引为“谋主”。公元八七六年农民军攻占蕲州（今湖北蕲春县）后，在王镣、裴渥的阴谋策划和引诱下，王仙芝准备接受招安。当朝廷送来授予他以“左神策押牙兼监察御史”官衔的诏书时，王仙芝“甚喜”，王镣、裴渥等连忙“道贺”。这时，黄巢拍案而起，怒斥王仙芝说：“当初，咱们‘共立大誓，横行天下’；如今，你个人却想去投降取官，你把五千起义弟兄置于何地！”并挥起拳头，把王仙芝打了个头破血流，广大起义军将士也同声怒骂不止。“仙芝畏众怒，遂不受命”。（《资治通鉴》卷二五二）经过黄巢与起义军群众的坚决斗争，制止了王仙芝这次叛卖活动。由于路线分歧，黄巢终于与王仙芝分裂，率军二千转入山东，独立作战。王仙芝此后以五万之众围攻襄阳，又再次动摇，派人去洛阳谈判招安，引起将士离心，终于失败被杀。

黄巢坚持“横行天下”的革命路线，愈战愈强，王仙芝余部均来会合，黄巢被推为王，自号“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改元“王霸”，明确表示与封建朝廷势不两立。起义军在黄巢领导下，横扫江淮流域，杀富济贫，开仓分盐，严惩贪官豪绅，冲破唐官军重重围剿，又渡长江，入江西，取浙江，由衢州劈山开路七百里，进占福州，又长征岭南，一举攻入广州，起义军发展到数十万人。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过程中，黄巢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政治上战胜了唐王朝与起义军中被俘官僚互相策应的招安诱降阴谋，克服了自己思想上的动摇妥协倾向。如公元八七八年，唐王朝以就地解散起义军为条件，答应授予黄巢以“右卫将军”的官职；公元八七九年，黄巢兵临广州城下，广州节度使李迢与已被俘随军的原浙东观察使崔璆又一再上书朝廷要求授予黄巢以“天平节度使”官衔，唐王朝答应给予正四品官“率府率”。对这些扑灭农民军的诱降条件，虽经谈判，但黄巢终于顶住了，“大怒未受”。

正因为黄巢既拒绝接受招安，又放弃割据一方，坚持了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在攻破广州以后，即决定整军北伐，并发布了声讨唐王朝的檄文，宣告农民军要杀去长安，“问罪”唐天子。接着，纪律严明的六十万农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跨长江，渡淮河，直下洛阳，猛攻潼关，于公元八八一年一月，在“举军大呼，声振河、华”的凯歌声中，赶走了皇帝，占领了长安，建立了“大齐”农民革命政权，对皇室、贵族、官僚大地主实行了严厉的镇压和剥夺，“甲第朱门无一半”，“天街踏尽公卿骨”，大长了劳动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地主阶级的威风。黄巢坚持的“横行天下”的革命路线，终于取得历史性的凯旋！

反压迫反剥削的“均平”纲领

在唐代，公元八五九年浙东农民起义军铸印“天平”，王仙芝发动起义时以“天补均平”作号召，黄巢自号“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把“均平”两个闪光大字写在战旗上，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均平”的革命纲领，标志着广大农民在斗争中锤炼出了新的思想武器。

农民革命的“均平”纲领，是针对封建制度下贵贱对立、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的黑暗现实提出来的。中唐以后的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全国大部分土地成为地主的庄园。封建统治者贪得无厌，穷奢极欲。唐懿宗李漼嫁女，一次赐钱五百万緡，几乎相当于朝廷全年的税收。不少大地主拥有佃户几百户，每年积粟达一万石。而广大农民过着“岁暮锄犁旁空室，呼儿登山取橡实”（张籍：《野老歌》），“自冬及于春，橡实诳饥肠”（皮日休：《橡媪叹》）的悲惨生活。这种富与贫、贵与贱、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极端不平等，正是罪恶的封建制度造成的。封建统治者及其文化奴才编造各种谬论来辩护这种罪恶制度。唐代以继承孔孟道统自居的反动儒家头子韩愈，就拚命叫嚣：“富与贵、祸与福存乎天”；老百姓必须把“粟米丝麻”、“器皿”、“货财”等全部劳动果实拿出来供统治者享受，否则就要杀头。黄巢大起义提出的“均平”的战斗纲领，就是要反对剥削压迫，打翻吃人的封建制度，改变那种土地财产不平均、权利义务不平等的社会状况。这是广大农民的革命愿望的深刻反映，是对孔孟儒家鼓吹“野人”养“君子”的“天下之通义”等反动纲常的有力批判。

列宁指出：“在反对旧专制制度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黄巢提出的“均平”纲领及其所建立的农民政权国号“大齐”，正是反映了在反对封建农奴制的斗争中的革命农民，已经明确要求政治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平均，要求变不平为均平，变不齐为大齐。黄巢起义军并以革命行动来实践这一革命纲领。公元八七八年，起义军南征到浙江天目山区，曾把官府屯积的大量的盐，夺过来分给了广大的贫苦人民。公元八七九年，起义军从广州北伐时，黄巢以“义军百万都统”的名义发表文告，宣布“禁止刺史搜刮民财，县官贪污的全家处死”。公元八八一年进军长安时，所到之处，镇压了大批皇室贵族、官僚豪绅，剥夺他们的财产，并打开仓库，救济贫苦农民，“千斯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对封建经济关系实行了猛烈的冲击。起义军在长安向广大人民义正词严地宣布：“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旧唐书·黄巢传》）

黄巢起义军的“均平”纲领及其革命措施，引起被打翻在地的贵族官僚的刻骨仇恨，他们咒骂：“自从大驾去奔西（指唐僖宗逃去四川），贵落深坑贱出泥。……扶犁黑手翻持笏（象征权力的手板），食肉朱唇却吃齑（切碎的腌菜）。唯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旧与天齐。”这却从反面充分反映出“均平”纲领的革命威力。把皇帝一赶跑，贵和贱、富和贫的封建社会关系就完全翻了个个儿，昨天的扶犁黑手即劳动人民掌握了印把子，从前的食肉者即剥削阶级寄生虫也不得不尝尝腌菜味；正好与过去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无怪乎劳动人民热烈欢呼：“高高山上一盏灯，天下穷人都苦寒；不是黄巢来造反，谁杀脏官八百万。”在民歌中永远纪念着黄巢大起义的革命功勋。

反天命反神权的“冲天”思想

黄巢反封建压迫的“均平”纲领，是以反天命的无神论的“冲天”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

黄巢的“冲天”思想，是长期以来日益觉醒的劳动人民不信天命信革命的光辉思想的新发展，是对孔孟儒家一贯宣扬的唯心主义天命论的一次革命大批判。

从董仲舒到韩愈，为封建统治者炮制的官方哲学，其核心就是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论来论证封建统治的合理性。董仲舒鼓吹“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韩愈叫嚣“天”具有“赏功罚祸”的无上权威，谁违反“天意”，就会遭到“天刑”。他们无非是想用捏造的天上的神权来维护地上的君权，维护父、臣、民的等级秩序。唐代中期，法家与儒家曾围绕“天”是否有意志的问题展开大论战，法家柳宗元、刘禹锡对儒家韩愈的“天命”叫嚣给予了猛烈批判，并对“天”作出了唯物主义解释。但法家局限于地主阶级立场，要维护封建的“法制”，只能“补天”而不可能去“冲天”。黄巢反映农民阶级的革命要求，破天荒地提出了“冲天”的战斗无神论思想，与儒家唯心主义的天命论相对抗，并把这种“冲天”思想付诸实践，化为广大群众冲击旧世界的革命行动。

黄巢早年写过一首《咏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诗中把农民革命力量比作傲霜盛开的“秋菊”，把封建腐朽统治比作即将衰落的“百花”，一旦时机到来，农民革命力量必将摧毁封建腐朽统治，农民革命的“冲天”理想就将随着农民革命武装的“黄金甲”杀进长安城而胜利实现。起义后，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坚持“横行天下”的革命路线，就是要冲破封建网罗，冲翻封建统治，杀去长安夺鸟位，暂为农民建政权。黄巢的“冲天”思想和“冲天”行动，体现了革命农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表白了对封建腐朽势力必败、农民革命力量必胜的坚强信念。黄巢在领导农民军向唐王朝勇猛冲杀中，特别是在农民军内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锤炼出了“冲天”思想，对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作了高度的哲学概括。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揭露黑格尔唯心主义关于“天”、“神”等的呓语时深刻地指出：“天——自然界——精神。打倒天：唯物主义。”一切唯心主义在自然物质现象和人类精神生活之上去虚构一个“天”，是完全荒谬的。打倒天，撕破唯心主义的天命神权之类的谎言，还世界以本来面目，就是唯物主义。黄巢的“冲天”思想，正是在与儒家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作斗争中发挥出的打倒天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思想精华。它武装了广大革命农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天”，把什么“畏天命”、“君权神授”、“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等等反动谬论，通通砸个稀巴烂。在“冲天”思想指导下，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冲得反动官军一败涂地，冲得封建皇帝放声大哭，冲得李家王朝土崩瓦解，把前期封建社会中反动统治阶级作为精神支柱的唯心主义天命论也基本上冲垮了，迫使北宋以后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改换官方哲学的招牌，充分显示了农民革命哲学的批判威力。

“冲天”，集中表达了农民革命路线的世界观基础。究竟是“冲天”还是“顺天”，是农民起义中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水浒》中的宋江，明火执仗地打着“顺天”、“护国”的黑旗，干着效忠封建皇权、扑灭农民革命的罪恶勾当，所以《水浒》作者要宋江在浔阳楼题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已充分暴露了《水浒》所宣扬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及其反动世界观基础，和历代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及其哲学基础是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把两者混为一谈，是对历史的根本歪曲。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唐末黄巢大起义以“冲天”思想和“均平”纲领动员和武装了广大革命农民，奋起战斗，用革命暴力彻底扫荡了门阀豪族残余势力，猛烈冲击了封建统治及其精神支柱，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过渡。黄巢大起义所提供的哲学武器，是我国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中的珍贵遗产。

五、宋代三次农民大起义“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纲领及其哲学基础

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的两宋时期(公元960—1279年),封建土地私有制和佃耕剥削形式进一步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宋王朝豢养了一百几十万反动军队,用以防止和镇压农民起义,对内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纵容官僚大地主肆意兼并土地,残酷压榨农民。为了换取苟安局面,宋王朝对当时北方西夏、辽、金的奴隶主贵族的侵扰采取屈膝投降的路线,每年要向西夏、辽、金奴隶主贵族政权缴纳数以万计的“岁币”。宋王朝通过增加赋税,加重徭役,把庞大的经济负担统统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削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

为了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两宋时期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似一伙”,给反动统治势力以沉重打击。

虽然由于宋王朝各地军事力量的箝制和受到民族矛盾的牵制,两宋时期的农民起义还没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大起义;但是在后期封建社会冲破反动理学的网罗而发展起来的农民起义,却磨锐了自己的批判武器。他们提出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反映了时代的新特点,达到了新的思想高度,给源远流长的农民革命哲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纲领

在两宋时期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中影响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王小波、李顺于公元九九三年领导的四川农民起义。这次起义中,王小波向农民大声疾呼:“我们痛恨贫富不均,今天起来造反,就是要为大家均贫富。”(“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卷八)。这一口号,说出了广大农民心里的要求,激发了他们对封建统治者纵容土地兼并所造成的“贫富不均”的满腔仇恨。饥寒交迫的广大农民奋起响应,“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沈括《梦溪笔谈》)在“均贫富”思想指导下,起义军诛杀了朝廷特诏褒奖的第一清官——彭山县令齐元振。起义军所到之处,把乡里富官大姓、土豪劣绅统统集合起来,命他们一一具报家中财产和粮食,除留下食用之外,一律没收,用来救济贫苦农民。(“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拨大赈贫乏。”——沈括《梦溪笔谈》)这种镇压反动派,剥夺剥夺者的革命行动,大大鼓舞了农民的革命斗志,挫败了宋王朝抚谕诱降的诡计。起义军很快攻下了四川首府成都,成立了“大蜀”政权,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

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唐末农民起义“均平”思想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均贫富”的革命纲领,并付之实践。这表明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的我国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已从要求摆脱人身依附进入到要求财产平均的新阶段了。

北宋末年,继王小波、李顺起义之后,公元一一二〇年江浙一带爆发了方腊起义。方腊起义发展了“均贫富”的革命思想,指出维护“贫富不均”的封建剥削制度的是“无平等,有高下”的封建法权,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革命主张(庄绰《鸡肋篇》卷上),进一步对封建的等级特权和阶级压迫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方腊按照“无有高下”的平等、平均原则,在起义过程中迅速把革命群众组织起来。他们实行官兵一致、平等互助的原则,起义军队中一人有难,众人相助(“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鸡肋篇》卷上)凡是起义军成员,虽不相识,来往经过,都管住管吃,财物取用,不分彼此,当是一家人(“凡出入经过,虽不相识,党人皆馆谷焉,

凡物用之无间，谓为一家”——《鸡肋篇》卷上）。方腊起义时还把“法平等”的思想写成文章，刻版印刷，四处张贴。广大农民在“法平等”的思想鼓舞下，“闻风响应”，“仗义而起”，组成了“众殆百万”的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很快地占领了六州五十二县，建立了“永乐”农民革命政权，显示了农民革命路线在农民战争中的巨大威力。

到南宋初年，公元一一三〇年，在洞庭湖边又爆发了钟相、杨么领导的农民起义。在王小波、李顺和方腊起义的基础上，这次起义更明确地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纲领，表达了广大农民政治上要求平等，经济上要求平均的革命愿望，第一次公开宣布维护“富贵贫贱”之分的封建“国典”是“邪法”，要用革命的暴力来实现广大农民要求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善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这次起义，波及洞庭湖周围数百里的范围，有四十多万贫苦农民参加，坚持斗争达六年之久，曾经建号“楚王”，改元“天载”，在鼎州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

宋代农民起义，经过反复斗争提炼出来的“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纲领，是唐末农民“均平”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反映了后期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新特点，把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制度和等级特权的革命思想推进到新的高度，更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孔孟之徒鼓吹的“富贵在天”、“贫而无怨”的宗教欺骗和道德教条。它是元末红巾军“杀尽不平”的斗争哲学和明末农民起义军“贫富均田”的革命思想的先导。

对唯心主义理学的革命批判

宋代农民在革命斗争中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纲领，同时，也提出了为这个纲领服务的反理学的哲学思想。

经过秦、汉、隋、唐以来历次农民战争的冲击，不仅孔孟儒家鼓吹的“天命论”已经百孔千疮，破烂不堪，就是隋唐以来盛行的佛教、道教也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反动统治者的需要。官僚地主阶级除了血腥镇压蓬勃发展的农民起义之外，急需一种新的思想武器来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精神奴役，于是程颐、朱熹等反动儒家代表炮制了一套唯心主义理学来为封建统治服务。

唯心主义理学实际上仍是殷周以来“天命论”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不过它给天命论罩上一层“天理”的哲学面纱，在为封建统治作辩护方面具有更大的欺骗性，说什么“君臣父子之分”、“贫富贵贱之别”，不仅是“命该如此”，而且是“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宋明理学的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用封建统治的纲常伦理来扼杀劳动人民“等贵贱、均贫富”，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要求。这是一种更精巧、更圆滑的“天命论”。

宋代农民为了实现“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纲领，对这种反动唯心主义理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方腊发动起义时对群众作的一次政治动员，对当时唯心主义理学的反动实质进行了深刻揭露。方腊对群众说：我们劳苦人民“苦于剥削久矣”！“普天之下，国和家本来是一个道理，今有老百姓耕田织布，终年劳苦，少许有了点粮食和布匹，统治者们都拿了去任意挥霍”。“挥霍之余又把大量财物送给辽和西夏的贵族统治者；他们得了我们的资助，反而又来侵侮我们，这时又叫我们老百姓去抵抗，老百姓力不能支，统治者就谴责打骂无所不至，……难道大家甘心吗？”群众齐声回答：“岂有此理！”（腊起曰：“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靡荡之余，又悉举而奉之仇讎；仇讎赖我之助，益以富实，反见侵侮，则使子弟应之，子弟力弗能支，则谴责无所不至。……于汝甘乎？”众曰：“安有此理！”

方腊在动员中和起义群众这段慷慨激昂的对话，运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现实材料，对反动统治者残酷压榨劳动人民的罪行给以无情的鞭挞，对为封建统治和投降主义作辩护的反动理学进行了有力的揭发和批判。在否定地主阶级“天理”观的基础上，南宋初年的钟相、杨么起义进一步提出了起义农民自己的“天理”观。他们义正辞严地宣称“杀人为行法”，“劫财为均平”。用革命暴力镇压地主、官僚、反动儒生等不劳而食的寄生虫，剥夺他们的财产，用来分给贫苦农民，实现“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理想，才是真正的“天理当然”。（《三朝北盟会编》）把理学家和封建“国典”所维护的封建统治者的行径，斥为“安有此理”，而把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行动，称为“天理当然”。这充分显示了宋代农民无法无天的革命造反精神和农民革命哲学的鲜明党性。

宋代农民为了实现“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纲领，还提出了变“黑暗”为“光明”的朴素的历史辩证法。方腊起义时曾利用摩尼教中“两宗三际”的思想资料，来宣传自己的进步历史观，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光明”和“黑暗”这“两宗”势力的对立斗争。这种斗争，经历着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阶段（“三际”）的发展过程：过去是“光明”和“黑暗”势均力敌相持不下；发展到了现在，“黑暗”暂时超过、压倒了“光明”；但是通过斗争，到了将来的阶段上“光明”一定能战胜“黑暗”。（见《佛祖统纪》和《摩尼教残经》）这种明、暗对立并在斗争中转化的素朴发展观，尽管披上了宗教外衣，但它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农民反抗黑暗统治、向往光明社会的革命愿望，有力地批判了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三纲五常、铁定不移”之类的形而上学的反动谬论，对当时的农民运动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为了变“黑暗”为“光明”，宋代农民在斗争中，通过血的教训，意识到采用暴力手段的重要性。钟相、杨么认为只有剥夺地主财产，才能实现“均平”理想，只有杀掉地主豪绅，才能建立体现农民“善法”的革命政权。方腊起义时，虽然利用过佛教的某些思想资料来宣传“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思想，但是对于佛教中以“慈悲度人”为幌子来反对革命暴力的教条却深恶痛绝，尤其憎恨，（“尤憎释氏，盖以戒杀与之为戾耳”——《鸡肋篇》）他反其道而行之，指出：只有“杀人”才能“度人”，只有使用革命暴力杀尽反动派，才能真正成“佛”，这个“佛”就是象征光明的“日月”，消灭黑暗统治，在人间建立起无限光明的世界，就是“成佛”。（见《鸡肋篇》）

宋代农民先后用革命暴力打出了“大蜀”、“永乐”、“天载”等农民政权，使得封建统治者胆战心惊，起义农民“不事神佛祖先”（《鸡肋篇》），“无视君臣上下”（《高峰文集·乞禁妖教札子》），勇敢地向封建神权、政权挑战，所到之处，烧官府，毁神庙，杀僧道，斩巫祝（《三朝北盟会编》），给封建黑暗势力以无情扫荡。他们不信天，不信神，相信的是自己的力量。靠谁来“均贫富”？王小波说：“吾为汝均之”！靠谁来行农民之法？钟相说：“我行法”！这充分表明广大劳动人民在斗争实践中，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越来越认识到暴力革命的重要性。这对封建统治者宣扬的天才史观和叛徒们宣扬的投降路线，是一个有力的回击。

宋代农民革命斗争中“等贵贱、均贫富”的战斗纲领，以及为实现这个纲领而提出来的进步历史观和采用暴力手段来推翻黑暗势力的变革思想，沉重地打击了宋王朝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批判了程、朱之流反动儒家苦心经营的唯心主义理学，对以后农民革命运动和反理学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全文未完待续）